



纪念遵义会议
80周年系列图书

征文集

纪念遵义会议八十周年



Z 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系列图书
h e n g w e n j i

中共遵义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分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征文集



Z 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系列图书

中共遵义市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K264.4
2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遵义会议八十周年征文集 / 中共遵义市委讲师
团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21-12317-6

I. ①纪… II. ①中… III. ①遵义会议(1935)—纪
念文集 IV. ①K264.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0424号



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系列图书

纪念遵义会议八十周年征文集

中共遵义市委组织部
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
中共遵义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责任编辑: 戴俊蒋梅

装帧设计: 郑亚梅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印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390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2317-6

定价: 48.00元

前 言

今年是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之年,也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80周年前夕,重温历史经验,弘扬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民主团结的精神,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深入研究遵义会议及其彰显的精神价值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把过去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应用到党的建设中去。

此次以“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主题的全国征文活动,目的在于通过深入研究遵义会议及其彰显的精神价值,加深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也加深对遵义市市情和遵义市红色文化的认识。“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征文活动从2014年5月26日开始,截止至8月31日,共收到全国各地的论文300多篇,几乎涵盖了有关遵义会议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虽然视角各异、深浅有别,却体现了不同类别的作者对遵义会议研究的政治热情和学术激情。活动组委会选聘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通过匿名评审的方式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60名。由于篇幅所限,论文集仅收录45篇文章,不少论文和文章未能收入到本文集中,割爱之后深表歉意。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对遵义会议精神文化内涵的探讨	(1)
遵义会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8)
论遵义会议精神中的军事民主及其当代价值	(20)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创造性推进群众路线思想建设的三个维度	(27)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40)
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期间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	(49)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53)
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59)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切实走好群众路线	(71)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是践行好群众路线的根本	(76)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增强党委议事决策能力	(86)
遵义会议精神的产生机理探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92)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101)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109)
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120)
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与思考	(135)
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作用	(143)
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研究	
——红色智慧的昨为今用	(151)



论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及其对青少年的价值导向作用	(161)
刍议中央红军在黔北的扩红工作	(167)
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提升服务群众水平	(176)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走实党的群众路线	(180)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让群众路线永放光芒	(184)
“中国仡佬第一乡”的红军情结	(189)
由遵义会议“90 字决议”谈贯彻群众路线改进文风的思考	(201)
浅谈“遵义会议”精神的现实启示与实践路径	(205)
遵义会议期间群众“幕后”拥军彰显民心向背	(211)
学好遵义会议精神 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221)
高擎遵义会议精神大纛 助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	(226)
由系列会议谈遵义会议精神	(234)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243)
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后勤供应工作	(248)
遵义会议透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因素	(256)
论“三人团”的分化瓦解与遵义会议的召开	(264)
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 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270)
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及弘扬路径	(279)
遵义会议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286)
试论弘扬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	
——纪念遵义会议八十周年	(290)
“四渡赤水文化”研究综述	(298)
遵义会议:中共和红军民主与团结建设的一个新起点	(308)
从遵义会议精神到群众路线教育	(321)
遵义会议前后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历史启迪	(327)
重大转折 全新起点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	(333)
将坚持群众路线纳入新时期党员标准的思考	(345)
遵义会议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356)

对遵义会议精神文化内涵的探讨

苗体君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遵义会议精神比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古田精神等提出的时间都晚,这和遵义会议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地位很不相称,迄今为止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表述尚无一个得到所有人认可的定论。我认为应该从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谈起,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我认为遵义会议的精神是:勇于探索、循序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精神;由放弃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的精神;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倡导民主团结的精神;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实现独立自主、务求必胜的精神。

关 键 词: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与形成;毛泽东;李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2011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纵观中共90年的历史有三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第一次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第二次就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第三次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已故的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原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的一部中共党史或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两场革命’,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取得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其间有两次会议在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另一次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①对遵义会议给予了极高的历史评价，如今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古田精神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表述，遵义会议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一、遵义会议精神提出的过程

井冈山精神最早是在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提出的，就此，毛泽东深情地说道：“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②1972年11月，邓小平在井冈山参观时曾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井冈山精神丢不得。”1989年10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登上井冈山时，深有感触地说：“这里是革命的摇篮，能从中汲取精神养料，我看这一点很重要。”他指出，井冈山精神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③此后，井冈山的精神被明确确定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关于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④关于古田会议的精神，古田会议纪念馆和福建省龙岩党史办合作，成立了一个古田会议精神研究会，通过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古田会议的精神被概括为：“思想建党，永葆先进；政治建军，人民本色；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团结奉献，勇闯新路。”

遵义会议精神比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古田精神等提出的时间都晚，这和遵义会议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地位很不相称，而且遵义会议精神的提出还有一个逐步趋于完善的过程，1995年1月10日至12日，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委党校、贵州省委讲师团、贵州省社科院、贵州省社

① 廖盖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人民日报》1995年1月18日。

②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③ 金钊：《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理论前沿》2003年第15期。

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00页。

科联和当时的遵义地委、行署在贵阳联合举行的“纪念遵义会议 60 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有会议代表把遵义会议及长征精神归纳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团结拼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①2002 年 4 月 22 日上午,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贵阳隆重开幕,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钱运录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开创富民兴黔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钱运录提出以“遵义会议精神”来鼓舞激励贵州干部群众改变贵州面貌,随后,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将遵义会议精神归纳为 20 个字,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②随后,这 20 个字的遵义会议精神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提到遵义会议精神时均采用此种说法,如,遵义市残联理事长黄运华发表在《中国残疾人》2005 年第 8 期的《遵义精神,再展辉煌》一文中说:“弘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③

2009 年 6 月 10 日,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专访时说:“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是历史留给世界、留给遵义的宝贵财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遵义会议都是我们战胜困难、走向成功的精神动力。”可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已经得到了官方及大多数专家的认可。但仍然有人就遵义会议精神提出自己的观点,如:为纪念建党 90 周年,2011 年 6 月 5 日下午,由遵义市党委宣传部、遵义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遵义会议精神”讲座在遵义师范学院举行,贵州遵义市原旅游局局长、研究“遵义会议”专家黄先荣在讲座中提出,遵义会议的精神是“建好统帅部,走出特色路”。可见,迄今为止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表述尚无一个得到所有人认可的定论。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与形成

该如何科学、全面、准确地表述遵义会议的精神?我认为应该从遵义会议

① 沈言实:《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纪念遵义会议 60 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贵州日报》,1995 年 1 月 22 日。

② 黄运华:《遵义精神,再展辉煌》,《中国残疾人》2005 年第 8 期。



召开的过程谈起,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

(一)勇于探索、循序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精神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但多数人并不知道在遵义会议前还召开了3次会议,即湖南通道、贵州黎平和贵州猴场三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以说这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召开前的“准备会议”,而在遵义会议召开后,还有2次延续会议,即云南扎西会议、贵州苟坝会议,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由此,可见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而我们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时,绝对不能孤零零地只研究遵义会议,而放弃对遵义会议前后召开的其他5次会议的研究。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正确的认识来源于不断的探索中,同时这中间又充满了曲折,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那样,“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

(二)由放弃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的精神

李德原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李德”是他在中国活动期间使用的名字,意思他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李德来中国前,仅有两次简单的军事经历,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把他请到中央苏区的,在当时的中央苏区“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②其他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对李德也很崇拜。并在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并成为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李德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在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独立房子”里按着地图指挥战斗,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长征的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采取了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

^① 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36页。

^②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48页。

再次使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当年,李德刚到中央苏区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已有八万多人”。^①当红军长征渡过湘江时,“只剩下三万多人”。^②1926年博古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回国,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的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③在遵义会议上,集中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及转移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批评了博古、李德脱离实际,错误估计敌我双方的实际力量,并停止了李德、博古对军队的领导。这也证明了,“什么时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改革就能取得胜利,什么时候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带来损失”。^④

(三)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倡导民主团结的精神

在中央苏区时,李德就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当时在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广大红军指战员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竟然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建了一个三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四周是稻田,在稻田里还专门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步行只需五分钟,“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⑤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两位高水平的翻译,并配备了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一整套服务人员,李德生活上的用品也都由总参管理局等部门特殊供应,有时李德还不满足,亲自去要。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24页。

②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第242页。

③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71~172页。

④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光明日报》,2010年5月18日。

⑤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5页。



当时,李德对妇女有着极大的兴趣,据陈士榘上将后来回忆说:“李德刚到部队,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①博古知道后,对李德依然是言听计从,在博古还没有来得及办理时,李德还是出事了。

因为这时李德已经看上了在团中央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他“对这位年轻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②,李德还不断地去找她,那位女同志的丈夫知道此事后,急忙向领导反映此事,对此有关领导对这位“洋钦差”也无可奈何。博古知道后,决定通过党组织,在红军女战士中郑重地为李德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最后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贞,为李德物色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广东籍女子,肖月华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反对嫁给李德,后来经过领导的多次说服动员,她以完成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李德结了婚。由此可见,博古对李德的方方面面都是有求必应的,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曾经回忆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③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李德推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推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战争中,李德极力推行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短促突击”、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方针,完全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游击战术,李德、博古二人还一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由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独断专权,党内民主遭到了严重践踏,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而在遵义会议上,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倡导民主团结的精神,当时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坦诚地交流着各自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激烈的争辩,最后也在服从中国革命的根本

① 转引自于继增:《李德在中国的婚恋传奇》,《文史精华》2009年第3期,第36~41页。

② 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39页。

③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48页。

本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共识。

(四)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实现独立自主、务求必胜的精神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军事指挥上的危害,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被解除。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而这个决议是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内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上还作出了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初期成立的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随后,1935年2月5日前后,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交界一带,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4日,中央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时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而上述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完成的,特别是毛泽东,他不仅拥有中国革命和战争实践经验,而且懂得中国革命和战争规律与特点,这为后来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提供领导上的保障,可以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极为深远。

(作者系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遵义会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孙树芳

摘 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并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的统治,使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取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就是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遵义会议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关 键 词:遵义会议;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夺取了黔北重镇遵义,其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既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机,又面临着艰难的战略抉择。当时摆在红军面前的最紧迫任务就是解决红军的指挥权问题,让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称颂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会议,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恰如其分的。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正是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领导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建立了新中国。

遵义会议以前,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是由于“我们党终究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了解的党。”^①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导致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究其根源,从党内原因看,是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还不懂得中国革命的规律,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②这表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征程中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从外部原因来看,主要就是由于共产国际“左”的理论的指导,特别是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内事务的干预和包办所造成的。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来,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成为国际性的事业,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发出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但在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主要应该依靠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革命,而不能靠任何国际组织来发号施令。毋庸讳言,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复杂原因,共产国际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遥控各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要求各国共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0.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0,339,338~339,299~300.



党绝对服从于、听命于这个中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崭新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在遵义会议以前又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几乎把中国革命拖入绝境。毛泽东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他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①1958年7月,毛泽东同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指出:在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②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当时出席会议的前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说:“中国共产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最初时期的幼稚和缺少经验,老是左右摇摆,时而犯‘右’倾错误,时而犯‘左’倾错误。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它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即苏区损失了90%,党组织以及党在白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作也遭受到严重损失,以至临时中央被迫于1933年撤离上海,迁于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与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却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党的利益替代另一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方面的教训已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次谈话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0,388,51,64~65,380,23.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0,388,51,64~65,380,23.

内容和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自然是毛泽东早就思考过的。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再加上在军事上依靠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丢掉了南方的根据地而被迫进行长征。撤出中央苏区时,执行了逃跑主义,红军损失惨重,使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抉择。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他说:“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①

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同党内教条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不唯书、不唯上,深入调查和研究中国国情,在党内最早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就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打击的主要对象,先后被剥夺了所兼的中央红军所有职务,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后来毛泽东说:“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重大损失,都是由于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所造成的后果。血的教训使广大干部战士开始清醒,他们纷纷要求变换领导,特别是原来跟着王明跑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经过毛泽东的帮助,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周恩来说:“在长征中,毛泽东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王稼祥也说:“在长征中,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转向毛泽东同志的决心。”伍修权在回忆中说:遵义会议“从酝酿

① 《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6~307.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110.